

让公平正义守护者拥有职业尊荣

今后,上海、广东等6省市的法官、检察官,或将面临职业环境变化。不但工资将由省里统一发放,而且在职务职级上也不再等同于普通公务员,在有些地方退休年龄也将延迟。而这,还仅仅是变化的起点。6省市根据中央要求试点的改革内容,将是更大范围司法体制改革的先声。这一改革的大幕,正被清风掀起一角。

透过试点改革内容,“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”的思路清晰可见。换句话说,通过司法改革,法官、检察官不仅责任更大,而且素质要求更高,职业保障更有力。正如中央政法办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的,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,是建设高素质

司法队伍的制度保障,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基础性地位,是必须牵住的“牛鼻子”。

需要看到,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,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成为“刚需”。很多司法人员非常辛苦,有一年要审数百个案子,但职业管理没有实现科学化和现代化,阻碍了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行。比如,有些地方审理离婚案子的法官非常年轻,有的还没结婚,说出的话自己都摸底,怎么能让人心服口服?有些地方的资深法官、检察官,希望有更好的职业发展,但上升空间有限,只好到非业务部门,甚至调出本系统。还有一些地方,由于职业保障不到位,频频出现年轻法官、检察官“跳

槽”现象。这些体制机制上的症结,都需要通过司法改革予以破解。

改革的目的是,不仅仅是要让司法职业者感觉“更有奔头了”,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职业的光荣与使命。人民群众对法官等职业是高看一眼的,原因在于他们是纠纷的裁判者,背后就是对司法权的尊重。这种尊重不仅来自群众,也应该来自司法机关本身。通过制度安排,让司法人员获得前景开阔的职业进阶,同时改变“审者不判、判者不审”的泛行政化倾向,让审理者负责,严格办案责任。事实上,近年来多地已经试行审判长负责制,在不违反相关诉讼法规定的前提下,赋予法官相对独立完整的审判权。让审理者对

所有案件质量负责,并且终身负责,必然会使其更加谨慎。

“凡法事者,操持不可以不正”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,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。肩扛公正天平、手持正义之剑,就要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,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。司法公正和国家治理、群众感受有密切关系,必须通过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予以维护。司法人员管理这个“牛鼻子”牵好了,法官、检察官才能真正发挥好正义守护者的作用。通过司法改革,也才能有更好地锻造一支扛得住、打得赢、判得明的高素质司法队伍,以制度之手维护公平正义核心价值。 白龙

禁售物品难禁售 治理尚需软硬两手

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禁止交易香烟就销售“烟标”,禁止销售“烟标”就卖“烟灰缸”;禁止销售请假条,“跑腿儿”、“代办”服务能帮你搞定……电商平台上,电商的管理团队和禁售商品卖家之间的“斗争”,就像是“道高一尺”与“魔高一丈”的较量。

无法深入到问题的本质。其实,违禁物品之所以会出现,除了需求这一直接动因之外,根本性的原因是规则精神和法制意识的缺失。我们不能说个人有需求,就应该拥有需求被满足的权利,在赤裸裸的欲望之上,人们还应该有理性的规则来约束行为,用法律的尺度来规范权利,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尺之一,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重要区别之处。否则,人和动物又有何区别,人类社会与丛林世界岂不是一般无二。

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,往往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。立法的问题,监管的漏洞,电商平台的独特性等因素也都在原因之列。出现问题不可怕,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矛盾中取得的。面对禁售商品难禁的问题,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从打击买家、抑制需求入手,在加强监管、规范卖家行为上发力,不断规范立法,封堵监管漏洞,加大执法打击力度,提高违法成本,是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。但是,从长远来看,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压舱石,不断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,着力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,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。 宋华

审计通报 本该“指名道姓”

6月17日,审计署发布“西电东送21个输变电项目审计结果”通报,审计发现各类违规资金超过66亿元。国家电网公司对相关单位负责人和责任人共计79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和党纪政纪处分。南方电网公司已对1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、诫勉谈话、岗位调整或降级处理。

涉及66亿元违规资金,处理89个责任人,这是审计署历时3个多月的“战利品”。私设“小金库”挪用13.8亿元用于发奖金,虚列工程套取资金,违规建楼购车,私自发放补助等各类敛财猫腻,也让人大开眼界。不过,令公众惊叹的是,这89人到底是何方神圣,为什么不能指名道姓地通报?为何只接受了“罚酒三杯”的党纪政纪处分,而没有遭受刑事司法处罚?

如果说涉案人员所需承担的刑事责任,还有待检察院、公安等司法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,有一个先追究党纪政纪处分,再追究刑事责任的时间过程。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审计通报要遮遮掩掩,羞羞答答,不向社会披露具体违规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单位、违规情节等具体情况,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之处?

应该看到,自中央改进作风“八项规定”实施以后,实名通报被党纪政纪追究的领导干部就成了一个惯例,无论是违反作风建设规定,还是涉嫌贪污腐败,上至“副国级”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、中石油前任总经理蒋洁敏,黑龙江省副省长邵付晓光,下至镇党委书记、科级干部等,无一例外,都在第一时间“点名道姓”地公之于众,赢得了社会广泛好评,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威慑。

既然,审计署发现的“西电东送”违规资金事实已经“板上钉钉”,国家电网、南方电网内部进行的党纪政纪处分已经执行完毕,就没有再隐去姓名,给当事人留个“面子”,让公众在“追究89人”的新闻中猜疑想象的必要,完全可以实名通报,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情权,以此警示违法违纪者。

其实,如同中纪委每周一次的作风建设典型案例通报一样,审计通报也是审计部门开展审计工作,维护法律威严,严肃财务纪律,形成舆论声势的一种必备手段。若通篇洋洋洒洒,绝不指名道姓,线条极其粗犷,语言笼统概述,让公众看不透,让通报官员与公众“躲猫猫”,根本就形不成不了舆论监督的压力,这无异于纵容违法违纪者。 陈健



巴西世界杯开赛了,球迷和酒精也分不了家。为此,杭州交警开展专项整治。仅首场比赛结束后1个多小时,便查处酒驾28起。24岁的小金,凌晨与朋友在酒吧看揭幕战。一看进球就激动,不觉间喝多了。结果,他因醉驾而被吊销驾照,5年不得再考驾照,且因有醉驾前科,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。(据《钱江晚报》) 评:世界杯带来了全球性的狂欢,许多球迷此时老婆可以没有,女友可暂别,但只要有点球看,世界便是阳光灿烂。而且,不少球迷看球还离不了酒杯,一高兴,便经不住“酒精考验”。如果只是喝酒,不开车,酒精或许是狂放的调节剂,把酒话进球,亦不失为人生一大乐趣。但喝高了,还要握方向盘,则贻害无穷,有的还因此闹得家庭妻不和,或造成个人健康的意外,结果,好端端的世界杯变成家庭悲、“世界悲”了。 文/言者 图/春鸣

“奢华毕业晚会” 反衬节俭教育“缺位”

6月17日,武汉市外国语学校500余名高三毕业生自发组织在汉口一高档酒店举行毕业晚会。学生们自筹资金近十万元举办了这场晚会。晚会上,男女学生身穿西装旗袍走过红地毯,庆祝高中毕业。(据6月18日人民网)

对于高三毕业学生来说,大家欢聚一堂,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,这本无可厚非,并将地点选择到高档酒店,而且投入十万元重金,未免值得商榷。

其实,近些年来,类似的“奢华毕业晚会”并不鲜见,殊不知,这不仅容易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沾染上奢靡之风,也可能引发大家相互之间攀比等不良心态。俗话说得好:成由勤俭败由奢。不良习气的产生,起初都源于对奢华消费的盲目追随。因此,为了引导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,培养他们将来成为优秀的人才,当从中小学抓起,做好青少年关于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的教育熏陶。

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,如今,公众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,于是,有一些公众花起钱来大手大脚,尤其是面对子女提出来的种种要求,往往都是“有求必应”。甚至,有的父母亲即便家境相对贫困,但为了子女“有面子”,也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为子女购置各类高档电子产品等,殊不知,这并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。

另外,前些年,公款奢华消费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,尤其是公款大吃大喝的问题,更是“铺天盖地”。而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相关硬性举措,旨在有效遏制公款吃喝等各类歪风邪气,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。当然,公众也欣慰地看到,当下,公款吃喝等问题已经得到了明显遏制,不少高端酒店不得不“关张”或者转型。

与此同时,社会上很多平头百姓也纷纷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勤俭节约的优良风气,而“光盘行动”便是生动有力的例证。而就在这样的大形势下,武汉市外国语学校数百学生自发组织“奢华毕业晚会”,尽管其行动属于学生自发,但相关学校也应当引起反思。如此大搞大办毕业晚会,也反衬出了校方在开展学生艰苦奋斗、厉行节约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。

当然,教育不只是学校的责任,需要社会、家庭与学校相互合作,希望各方能够切实加强对学生青少年的品德教育,从而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! 周歌

广场舞应是有节制的韵律

广州市近日出台《广州市公园条例(草案)》向社会征求意见。其中规定:超出限定时间和限定区域、超过相应分贝的广场舞可能被罚最高1000元。而记者走访发现,几乎所有的公园广场舞都超过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规定的60分贝上限。

“中国大妈”天下无敌,买黄金满世界“抄底”,“广场舞”不但公园跳、广场跳、机场候机跳,高铁里跳、高速公路旁车时跳,甚至“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”,“攻占”了卢浮宫、莫斯科红场。

心理学家荣格提出“集体无意识”概念,表现在行动上,就是一个群体处于无意识的支配下采取没有知觉的行为,这种行为为时不必有人领导,也不用着谁来号召。至于群体中的个体,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做出许多和平时性格完全不同的、个人状态下不敢做的事情。广场舞不也如此吗?一位大妈不会跳,大妈们凑到一块,不用谁号召与领导,一块小小空地、一台简陋音响,足矣。一旦舞曲响,舞步起,便进入“自由王国”,别说周边居民提意见不起作用,哪怕高考这么重大的时间节点,要请大妈们休息几天也不容易。

健身也罢,交际也罢,消除孤独也罢,大妈们有跳广场舞的自由。可是,且不说一些“舞者”常年占用公共场地跳舞挤占他人应享的公共空间,高分贝的噪声对他人的权利乃至身体健康也是一种伤害。当一个群体的自由伤害他人的权利,这事就要协商解决,相互让步,双方取得最大公约数。因此,

广场舞可以跳,但要成为自我节制的韵律,也就是说要有规矩,不能不把他人权利放在眼中。

具体到《广州市公园条例(草案)》,相关条款应该精细化,更具可操作性。譬如说时段,广场舞晚上10点可以结束,对上班族来说,如果是节假日,晚上10点甚至再晚一些也无所谓。因此,在时段上不妨再人性化一些。再说噪声测定,不能在广场舞中心区测,也不能太远测,应以距离跳舞区最近、受噪声影响最大的居民楼为宜。取得共识,设立标准之后,就要落实执法主体,真抓实干,该罚要罚,该关要关,不能因为法不责众而流于形式。 王钰

捆绑执法 映射粗暴行政

在江西赣州寻乌县,符合计生政策的新生儿想要上户口,父母一方必须进行结扎手术。此外,包括村委会、居委会等在内的基层组织,甚至将农村危房改造等行政事项的办理,都与计生政策相挂钩。此事被媒体报道后,当地回应称,相关单位确实存在违规行为,将立即整改。

看起来,媒体在介入一些地方计生领域的行政乱象方面,可谓成效卓著。此前不久,媒体关注到江西修水县拒绝给超生婴儿上户口事件,当地同样“迅速整改”。而在贵州,兴义市将计生政策与义务教育“捆绑执法”导致一村民割腕自杀,当地亦在报道次日表态取缔。表面上看,地方政府似乎是“闻过即改”,但深层而言,却是一些政府部门对于粗暴式行政的迷恋。

追寻相关法规条文,一切属于计生捆绑的做法均找不到法律投意与支持。对此,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未必真不知道,然而又为何要等到媒体曝光才来纠正?它只能表明,在媒体的关注之外,在一个特定的县域环境当中,行政权力仍处于某种不可控的状态。它既不受各种法规的约束,同样也不受公民权利的制约,至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许多时候也形同虚设。

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,不会主动地选择依法行政,只会天然地选取粗暴与蛮横。这就是为什么,“计生捆绑”这样一种饱受指责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仍大行其道。“计生捆绑”作为一种粗暴式行政,绝非一句简单的懒政就可以卸责,它更体现为一种行政权力如何对待公民权利的伦理态度。这种伦理态度,在一个提倡尊重公民权利的时代,必须受到检视与检讨。

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,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,为了实现计生的目的,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。完整的权利不应有其他附加条件,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,也正是美国法律学者霍菲尔德所称的,权利就是“有权不受某种对待”。然而多起“计生捆绑”的现实,表明行政优于权利的思路在基层仍占有极大市场。

必须看到,当前,一些越界以及未经授权的权力,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缘起。因此,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指出,“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:一方面,如何限制、规范、约束公权力,另一方面,保障民众的权利”。 杨耕身

高官退休任职更需从严限定

近日,“吉林3位副省部级官员在企业担任领导”的信息引发关注。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调查发现,3位高官分别是吉林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、吉林银行原董事长田学仁,吉林省原副省长、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牛海军,吉林省原副省长、东北证券原董事长矫正中。

此前,吉林省在通报整改情况时,只说3位在金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副省长官员,业已处理完毕,但并未点名。当时说,一人因个人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理,另两人也已辞去在企业兼任的职务。现在看来,“被处理”的那一位,也并非是因为在企业违规任职,而是受贿。那么,就违规任职本身是否还有什么处理?现在还不知道。

实际上,现行法律对于官员在企业任职早有限制性规定,《公务员法》明确规定,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,“不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,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。”遗憾的是,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遵守。

吉林省3位原副省部级官员中,田学仁原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,曾任几个地市的主要领导;牛海军也曾任市主要领导、审计厅长;矫正中先后任职吉林省财政厅厅长,吉林市长、市委书记,等等。这些官员与其退休后任职的企业,能说是没有直接关联性? 然而,3人却均在2008年1月退休后即

转任金融机构董事长。其中,矫正中更是在2007年,还在副省长任上时,即增补为上市公司东北证券董事。可见,严肃的法律规定在一些高级别官员面前,被轻松突破。而这样明显的违规、违法行为,居然还被当地媒体解读为金融产业发展的“新的风景线”,不知“新”在何处?又是谁的“风景”?

或许是因为退休官员违规任职现象多发,去年中组部下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(任职)问题的意见》,进一步明确离退休官员任职的禁止性规定。该意见出台后,A股上市公司一度掀起了独立董事离职潮,这些“独董”很多都是退休的高官。 但此前《公务员法》屡屡被突破的教训

说明,对于违规任职,还需要更多程序性和惩戒性的细则。比如,这3位副省部级官员违规任职,除了辞去职务外,他们本人和相关单位,还需要承担哪些责任?香港首长期公务员离职后,政府就都会记录其从事外间工作的基本资料,供公众查阅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?否则只要退休官员“低调”一点,外界就很难知他们的任职情况,也就难以监督。

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官员去“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”的领域任职,是为了防止权力资源被滥用,而职位越高的官员,其“相关”的领域越大,也就越要从严限定。因此,对于3位副省部级官员的违规任职,应有后续“说法”,相关的制度也需进一步完善。 胡印斌